

NO ISLAND IS AN ISLAND

Four Glances at English Literature in A World Perspective

孤岛不孤

世界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四论

[意] 卡洛·金兹伯格 (Carlo Ginzburg) 著

文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NO ISLAND IS AN ISLAND

Four Glances at English Literature in A World Perspective

孤岛不孤

世界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四论

[意] 卡洛·金兹伯格 (Carlo Ginzburg) 著

文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岛不孤:世界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四论 / (美) 金兹伯格著; 文涛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75-1886-5

I. ①孤… II. ①金…②文… III. ①英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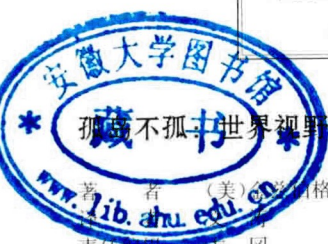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1762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孤岛不孤:世界视野中的英国文学四论

著者 (美) 金兹伯格

责任编辑 古冈

封面设计 蒋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h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插页 1

印张 4.75

字数 76 千字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1886-5/I · 1135

定价 28.8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NO ISLAND IS AN ISLAND: FOUR GLANCES AT ENGLISH LITERATURE IN A WORLD
PERSPECTIVE

BY CARLO GINZBURG,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JOHN TEDESCHI

Copyright © 2000 BY CARLO GINZBURG, 2000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uigi Bernabò Associates SRL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0—619 号

致 谢

这四篇论文于 1998 年 2 月和 3 月递交给纽约的意大利研究院。我愿意感谢理查德·布理昂特 (Richard Brilliant) 院长,使我可以在那里得到两个月愉快研究机会。

这本小书讨论的主题也曾是 1998 年 1 月剑桥大学克拉克演讲系列的题目,形式上略有不同。我感激三一学院的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和埃玛·罗斯查尔德 (Emma Rothschild) 的盛意邀请。

无论是在剑桥还是纽约,许多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帮助过我。这里不可能对他们一一致谢。我仅应提到福兰克·墨罗蒂 (Franco Moretti) 教授,我曾与他多次长途漫步和挑灯夜谈,我们的对话持续了许多年。

我非常感激我的朋友约翰·戴斯奇 (John Tedeschi) 将序言翻译为英文,感谢塞姆·吉尔伯特 (Sam Gilbert) 认真地做了文体上的校订,以及莎拉·圣·翁奇 (Sarah St. Onge) 非常胜任的编辑工作,这很大程度地改善了我原来的文本。

序 言

这四篇文章被一个共同的主题贯穿在一起,即标题里所提到的大不列颠岛,它既指真实存在着的
不列颠岛,同时也指想象中刻画出来的不列颠岛。这四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视野:英国文学并非孤立于英伦三岛的。这本书的整体性并不仅仅是(或者甚至并不主要地是)体现在主题的连贯上,一条相似的建构原则指引了我的研究及其表达方式。虽然只有在回溯这些过程时才能确认这些原则的一些特征。

事情总是由发现引起,这次是与另外一项完全不同的研究擦边儿引起的一个发现。我偶然发现基罗加主教(Bishop Vasco de Quiroga)对莫尔(Thomas More)《乌托邦》的看法,以及对丹尼尔(Samuel Daniel)的《为韵文辩》的意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出于机缘而非特意的好奇心的驱动。每次我都觉得意外的兴奋,觉得遇上了幸运的东西,甚或是重要的材料;同时敏锐地觉得自己的无知。时不时地也有问题的答案闪现在我面前:比如,意识到《项迪传》与培尔(Pierre Bayle)的《历史与批判辞典》之间形态的相似性。但那问题是什么呢?只有通过研究我才能最终确切地阐述出来。我不知道这样从结尾处、从答案处开始,尔后反方向地进行研究是否为其他人从事知识

性工作的通常方法。对我个人而言,因为主观客观上的理由,这样的倾向随着研究过程愈发明显。

让我先讲讲客观原因,这个与论说文这种体裁的各种局限相关。我过去十年实践的几乎都是这种文体。阿多诺(Adorno)在他的《作为形式的随笔》中写道:“论说文在其过程中成为真实……它的观念从对自身不明朗的结尾处取其要义,而不是从其开端处。”^①

阿多诺多处强调论说文作为一种文体特有的不可推断的因素。对论说文的读者来说,经过一般而言曲折复杂的论证过程,论说文的结尾处本质上即为不可知的。因此阅读好的论说文带来智力上的惊奇。对于论说文的写作者来说,终点常在开始写以前就已经知道了。假设开始研究前结论已知,意味着论说文的形式特征提供的可能性也进一步丰富了。我认为我是这么做的,即使并非有意为之。

然而这里的四篇果真是论说文吗?论说文,尤其是英语论说文的传统起自艾迪生(Addison)与兰姆(Lamb),文雅并且世界主义式的谈话,格调讲究而形式随意,主题常是无关痛痒的托词。熟悉这传统的都会否认这几篇论说文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们并非轻轻松松,而是带着知识类观察的厚重。可是有些人将论说文定义为一种从蒙田(Montaigne)到狄德罗(Didero)以至后来发展的文体,他们是不会为文章后面的注解所吓跑的。愉悦的对谈中溢着学识,而这样的对谈可被断定为论说文这类写作文体遥远的起源。^② 这正像斯塔罗宾斯

① T. W. Adorno, 《作为形式的随笔》(“The Essay as Form”)(1958), *New German Critique*, no. 32 (spring-summer 1984): 151—171, 尤其是第 161 页。

② Athenaeus, *Deipnosophists* (《餐桌上的诡辩家》)。参见 M. Bakhtin, 《小说话语的史前史》(“From the Prehistory of Novelistic Discourse”), 在《对话的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ed. M. Holquist (Austin, 1981), 第 42—83 页, 尤其是 52—53 页。

基(Jean Starobinski)提醒我们的^①，“论说文”这个词的词根(从中古拉丁语 *exagium* 而来，意为“平衡”)是将这文体与提交观点以求证实的需要联系起来。但是，这词的意思也总在“验证”与“尝试”之间摇摆。比如，蒙田那有名的篇章是如此说的：“总之，我在这里涂抹的零零碎碎不外是我生活中各种试验的一份记录”(《随笔集》3:13)。^② 此处这个词的模棱两可很有说服力，虽然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想到意大利语中的 *prova* (意为“证据”、“检验”)，即足够了。任何确认和查证都非最终性的：谈及论说文，阿多诺告诫说：“自我相对化内在于其形式。”^③

论说文行文拐弯抹角，天马行空，飞扬跳脱，这与验证所需的严密并不相容。但或许正是此种灵活性才得以保有某些格局，免受整齐划一的学科规范的束缚。在莫尔的《乌托邦》所属何种文体这个问题上，我与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不同的意见也许对阐明此点有所帮助(见第一章)。有人可以反对说那本《乌托邦》为一特例，因为它属于那类少有的开启了一种写作体裁的文本。但我自问那种明显的体裁形式上的技巧性争论——比如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吵得热闹的韵文合法性问题——怎么会被操作到忽视其欧洲大陆起源的地步，这起源始自蒙田。这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学术研究这类棋局中，庄严的文学文本为棋盘中的车，沿着直线型，横冲直撞；相反地，

① J. Starobinski, 《谁能定义论说文?》(“Peut-on définir l'essai”)在《斯塔罗宾斯基：涂鸦集》中，(Jean Starobinski, *Cashier pour un temps*) (巴黎, 1985), 第 185—196 页。

② M. de Montaigne, 《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ed. A. Thibaudet and M. Rat (Paris, 1962), 第 1056 页。参见《蒙田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Montaigne*), ed. D. M. Frame (Stanford, 1958), 第 826 页：“In fine, all this fricassee that I am scribbling here is nothing but a record of the essays of my life.”

③ T. W. Adorno, 《作为形式的随笔》，第 164 页。

作为一类文体的论说文充作棋盘上的马,位置移动不可捉摸,从一门学科跳到另一门,从一项文本实体冲到另一项。^①

而主观的偏好也一样进入这本书里的学术思考中。20年前,在一篇题为《线索》的文章中,我提出了一项“明显不能被证实的”假设,来解释叙事性的起源,这曾引起若干文学学者的兴趣,比如特伦斯·卡佛(Terence Cave),克里斯托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安东尼·孔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我当时推断,叙述的观念本身起源于狩猎社会中,在最细微的痕迹的基础上,传达一项不能直接经历的事实,类似于确认说“已经有人经过这里了”。这个分析模型取自于猎手们对猛兽的追猎(或者说,到了后来,取自于占卜术),我称之为“证据型话语”。我将之投射到极其遥远的历史视野中,实际上是千万年以前的历史中,为的是试图给我自己做研究的方法提供某项指导。^② 我仔细思考那篇一直隐约维系着我研究原则的文章,因为那时构想的关于叙述性起源的假设也能用来清楚地说明历史性的叙述:这种叙述不同于其他形式,致力于寻求真相,也因此它的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为叙述形式中的问题及答案所调整成形。^③

① V. Shklovsky, *La mossa del cavallo* (1923), trans. M. Olsoufieva (Bari, 1967); V. Foa, *Il cavallo e la torre* (Turin, 1991).

② C. Ginzburg, 《线索、神话与历史方法》(*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Baltimore, 1989), 第96—128页, 102—103页。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以很有兴趣的口吻评论说是“一项值得新石器时代的猎手尝试的姿态”(La Repubblica, January 21, 1980)。参看 T. C. Cave, 《辨认:一项诗学研究》(*Recognitions: A Study in Poetics*) (Oxford, 1988), 第250—254页。C. Prendergast, 《模拟的秩序》(*The Order of Mimesis*) (Cambridge, 1986), 第220页, 及下一页; A. Compagnon, 《魔鬼与理论》(*Le démon de la théorie*) (Paris, 1998), 第139—140页。

③ 我在《历史、修辞和证据》(*History, Rhetoric, and Proof*) 对这一点有更深入的论述,那本书是梅纳罕·斯特恩(Menahem Stern)耶路撒冷演讲的结集(Hanover, N. H., 1999)。在《迷醉:揭开巫师咒语之谜》(*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New York, 1990)一书的结语部分,我也在讲叙述及其内涵的主题。

反方向阅读现实,从其暧昧处着手,以避免为智性设计捕获而失去自由思考;对我而言,这于普鲁斯特(Proust)很亲近的观念,也表达了一项启发了以下书页的研究理念。^①

我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活的,借助于例如列奥·斯皮泽(Leo Spitzer)、埃里克·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以及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这类学者发展的批评阐释工具,调查那些非文学的文本(尤其是那些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卷宗)。^②早晚我都会来分析文学文本,这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次新的研究经历也吸收了过去学到的功课。意大利北部讲弗留利语的磨坊主多梅尼科·斯堪德拉(Domenico Scandella),外号叫作梅诺乔(Menocchio),因为他观念的不同为异端裁判所判了死刑。^③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个人对于阅读的利用性阐释常常是不可预测的。我以相似视角来阐释基罗加主教,他读过希腊人卢西安(Lucian),也读过英国人莫尔;英国人乔治·帕特纳姆(George Puttenham)与丹尼尔读过欧洲大陆上的蒙田;英国人斯特恩(Sterne)读过欧洲大陆上的培尔;诸如此类。每一例中,我试图分析的并非历史源材料的重新利用,而是更宽广更短暂的文化实践和历史空间: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以及这关系对于现在的意义。

① C. Ginzburg,《让事情奇怪起来:一项文学手法的史前史》(“Making Things Strange: The Prehistory of a Literary Device”),*Representations* 56 (1996): 8—28,尤其是第19页以及下页。

② Ginzburg,《历史,修辞和证据》的前言部分。

③ C. Ginzburg,《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Baltimore, 1980)。

目 录

致谢	1
序言	1
第一章 从无有乡处看新旧大陆	1
第二章 自身即为他者：伊丽莎白时代构建英国身份	31
第三章 寻根求源：重读《项迪传》	59
第四章 土斯塔拉与他的波兰读者	85
人名、著作名对照表	113
索引	125
译后记	135

第一章

从无有乡处看新旧大陆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Seen from Nowhere

1

成功的炫目可能会遮盖其背后的真相。莫尔的《乌托邦》产生了巨大的震荡,这激发它的阐释者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其放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很长时间里这场学术讨论严重两极分化,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比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对比起来,戏谑诙谐与严肃的政治思考不容彼此。这些多多少少的也令人信服一些。可是对于这篇常被认为非常难懂的文本,这些争论并未能将该文本的多个维度考虑进去。

斯金纳的权威性文章可使我们开启一个不同的讨论重心。他的讨论是从“这本书的中心主题”开始的。这主题“标题页上”开门见山,上面写道:“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也就是说,莫尔的关注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乌托邦这座新岛屿;而是在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斯金纳澄清了这点,提出“一种阐释莫尔文本复杂性的方法。如果《乌托邦》是文艺复兴政治理论常见文体的一个例子,也许最好不要从莫尔的文本自身开始,而是尝试着去指明这类文体一般情况下所具有的预设和惯例”。

斯金纳论述说,莫尔《乌托邦》中有几段讨论,要么是回应和模仿古典人文研究者广泛阅读的文本,要么是间接地提及这些文本作为典故。这些广为阅读的文本正与共和政体最佳形式的讨论有关,比如西塞罗(Cicero)的《论义务》。根据斯金纳的观点,莫尔要表明的是:“如果非德行不能有真正的高贵,那么简单地支持那些维护私有财产的通

常理由,便在逻辑上不连贯。”^①同理,柏拉图(Plato)论述取消私有财产,这显示出人文传统中的不连贯,这传统是以西塞罗为基础的。

莫尔《乌托邦》对西塞罗与柏拉图的论述有模仿,有回应,这无可否认。可斯金纳的论述似乎并非令人信服。斯金纳强调对历史文本进行语境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层面上,这一点我甚是赞同。而问题是:莫尔的《乌托邦》果真完全类属于文艺复兴时期讨论共和政体最佳形式的政治理论文体,像斯金纳指出的那样吗?斯金纳的语境分析策略从《乌托邦》的标题开始,然而他的引文却有漏缺,并不完全,这一点令人诧异。这本书的第1版1516年底出版于比利时的鲁汶,出版商是迪尔克·马顿斯(Dierk Martens)。第1版书名从头到尾是:“*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 [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宝书]。”

第2版1517年出版于巴黎,原来的“*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既有益又有趣]”变成了“*non minus utile quam elegans* [实际有用也趣味高雅]”。第3版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Festivus* 这个词——我暂时将其译为“有趣的,娱乐的”——与素朴严峻的政治哲学传统并不相融,而斯金纳认为《乌托邦》正是属于此传统的。我的观点是,莫尔的这本书不属于政治哲学这个传统。两个形容词性的修饰性用语“*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既有益又有趣]”以及

① Q. Skinner,《莫尔伯爵的〈乌托邦〉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语言》(“Sir Thomas More's *Utopia* and the Language of Renaissance Humanism”),收入《早期现代欧洲政治理论的语言》(*The Language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 A. Pagden (Cambridge, 1987),尤其是第123、125和155页。同时参见斯金纳令人信服的对耶鲁版本《乌托邦》的评论,收入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第153—168页。

它们之间的关系像是指向一个不同的传统。^①

我强调 *festivus* 这类词的重要性,看起来似乎是听了 C.S. 刘易斯(C.S. Lewis)那著名的告诫:即别拿莫尔这本书太当回事儿,而现代的读者正是倾向于过于严肃地对待这本书了。^② 事实上,与刘易斯的观点完全相反,我认为,要完全理解莫尔《乌托邦》的整体意义,这本书严肃的、时而冷漠恐怖的那一方面绝对地关键。另外,如果说我的结论定会与 C.S. 刘易斯的不同,我采取的研究途径却近似于 3 他很久以前所倡导的。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从信件和文献入手。这些信件与文献或者是莫尔亲手所写,或者是出自他那些友朋、相识们,收入了《乌托邦》早期的版本中。^③

2

《乌托邦》的第一版是经过人文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的仔细查阅的。通过阅读他的信件,我们几乎能逐日地看到他如何收集、大

① 写完这些之后,我才读到 S. Rossi 精彩的论文“Profilo dell'umanesimo enriciano: Erasmo e Thomas More,”in *Ricerche sull'Umanesimo e sul Rinascimento in Inghilterra* (Milan, 1969),第 26—63 页,这篇论文对 *festivitas* 有非常精确的评论。同时参见 S. Dresden,“Erasme, Rabelais et la ‘festivitas’ humaniste,”in *Colloquia Erasmi Turonensis*, vol. 1 (Paris, 1972),第 463—478 页(这是通过 Ofer Nur 引起我注意的)。

② C.S. Lewis,《16 世纪戏剧之外的英国文学》(*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Oxford, 1954),第 165 页,以及以后几页,尤其是 167 页。

③ 尤其可以参见 P. R. Allen,《〈乌托邦〉和欧洲人文主义:前言性质的书信与韵文的功用》(*Utopia and European Humanism: The Function of the Prefatory Letters and Verses*),*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10 (1963): 91—107 页。

概也会润色那些介绍性的信件,增加辅助性注解,以及向杰出的人文学者比如纪尧姆·布代(Guillaume Budé)推崇这本书。后者为这本书的第二版撰写了一篇长稿。^① 关于伊拉斯谟如何深入地介入这项计划及其意义何在,我后面会讲到。目前,让我们从《乌托邦》的第一个版本开始,1516年出版于比利时鲁汶的一个四开本,版本不大。^②

扉页的背面是一幅粗糙的乌托邦地图,标题为“乌托邦岛图”。下一页上展示的是乌托邦字母表,一首用乌托邦语言写成的诗,还有它的拉丁文翻译。接着是另一首用乌托邦语言写的诗:“六行诗赋于乌托邦岛,阿尼摩利乌斯(Anemolius)作,为桂冠诗人,是希斯拉德(Hythlodæus)的外甥,”希斯拉德是一位旅行者,是他描述了乌托邦岛上的各种律令和风俗习惯,这属于莫尔《乌托邦》第2卷的内容。那首小诗翻译成散文是这样的:“古人称我这个地方为乌托邦或无有乡,因为是与其他地方完全隔离的。而现今世上,这个地方实在可与柏拉图的共和国相媲美,也许甚至比它还要更胜一筹。原因如下:柏拉图只是用言词描述[*deliniavit*]了一个地方,而我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居民、资源和律令方面来彰显[*praestiti*]之,并且展示得还非常精彩。以甜蜜乡或快乐地来称此间天堂,真的并非虚名。”

Deliniavit ... praestiti: 柏拉图的共和国为莫尔的乌托邦所胜出,图画式的描述不及真实物的展示。可是,难道说莫尔的乌托邦不也只是一种描述吗?自然是,却是一幅让人如临其境的描述。这第1
4 版中,接下来是一封信,是比利时安特卫普城的书记官彼得·贾尔斯

① 参见 P. S. Allen, *Opus Epistolarum Des. Erasmi Roterodami* (Oxford, 1910)第2卷,书信 461、467、474、477、481、484、487、491、499、502、508、513、524、530、534 和 537。

② J. H. Lupton 的《莫尔伯爵的乌托邦》中第64及以后各页中有具体的描述。